

Wen Yi De Chao Yu Xing Ping Ge Zhi Si

Wen Yi De Chaoyuexing Ping Ge Zhi Si:
Haidegeer Shixue Xintan

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

——海德格尔诗学新探

钟 华◎著

人民出版社

Wen Yi De Chao Yu Xing Ping Ge Zhi Si

Wen Yi De Chaoyuexing Ping Ge Zhisi:
Haidegeer Shixue Xintan

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

——海德格尔诗学新探

钟 华◎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田 园
帧式设计:东昌文化
封面设计:吴燕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海德格尔诗学新探/钟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01-010581-9

I. ①文… II. ①钟… III. ①海德格尔,M. (1889~1976)—诗歌研究
IV. ①I51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1421 号

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

WENYI DE CHAOYUEXING PINGE ZHISI

——海德格尔诗学新探

钟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8.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0581-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内容摘要

本书首次以“文艺的超越性品格”问题为核心,系统清理、重新审视和解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和诗学思想系统。

海德格尔终生关注“文艺的超越性品格”问题,并对其有过独特系统的理论诉求和杰出的批评—阐释实践。这方面的思想不仅是其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准确理解其诗学思想实质的关键所在。凭借其出自本源的深刻性,它们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穿透力,可谓是海德格尔诗学中极核心同时也是对现时代文艺创作和诗学美学研究极具启发意义的思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它们却长期未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忽视其关于“文艺的超越性品格”方面思想的研究,是目前海德格尔诗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缺失。这一缺失的产生,除了政治纠葛与纷扰、社会接受与选择、海德格尔未明确做此命名、海德格尔思想自身的复杂性和过渡性色彩等因素之外,主要还是“科学主义”、“后现代”两大思潮和现时代的“消费主义文化”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关于“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不仅贯穿了海德格尔整个哲学—诗学思想历程的始终,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有着内在逻辑钩连的思想系统:

从时间上看,它以1927年出版的 *Sein und Zeit*(《存在与时间》)为起点,以论文集 *Wegmarken*(《路标》)中1930年发表的“Vom Wesen der Wahrheit(论

真理的本质)”的演讲为突破,以 *Holzwege* (《林中路》) 中 1935 年发表的“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艺术作品的本源》)”的系列演讲、20 世纪 30—40 年代写作的两大卷 *Nietzsche* (《尼采》)、以及与此差不多同期写作的 *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 (《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厚厚几大卷对荷尔德林“赞美诗”【如 *Germanien* (《日尔曼人》)、*Der Rhein* (《莱茵河》)、*Andenken* (《追忆》)、*Der Ister* (《伊斯特河》) 等】的课堂讲义,还有《林中路》中 1946 年发表的“Wozu Dichter (《诗人何为》)?”的演讲等为全面展开,以《路标》中同在 1946 年写作的“Beruf über den Humanismus (《关于人本主义的书信》)”以及整个集中在 50 年代写作的 *Unterwegs zur Sprache*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为进一步深化,以海德格尔几近耳顺之年亲自动手写作长达 130 余行的长诗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出自思的经验》)、1966 年《〈明镜周刊〉访谈录》中对现代艺术的担忧,以及临终前亲笔写下遗嘱要求儿子在他的葬礼上诵读自己亲自选好的荷尔德林的五段诗句为终点,海德格尔以他毕生的精力和实际行动系统表达了对“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诉求与坚守,以及对于具有“超越性品格”的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的热爱。

从内在逻辑理路来看,海德格尔基于“生存论—存在论”立场,对诸如“美”、“艺术”、“艺术作品”、“诗”、“真理”、“(诗性)语言”等一系列“美学”、“艺术哲学”范畴所做的全新思考和界定,对诸如“文艺与真理的关系”、“文艺与此在在世存在的内在的本质关联”、“世界黑夜(贫困)时代文艺家的天职与天命”、“一切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的标准”等一系列“美学”、“艺术哲学”重大问题所做的重新思考和言述,对“美学”“艺术哲学”的学科观念和研究范式所做的重新考量与确立,对历史上曾经被人们忽视甚至遗忘了的伟大艺术家及其伟大作品所做的“重新发现”和长期坚持不懈的阐释(尤其是对荷尔德林)等,都无不指向“文艺的超越性品格”这个核心问题。通过这些独特、新颖而又深刻的论述和阐释,海德格尔不仅给我们“敞亮”了“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三个基本维度:文艺的“形上之维”、文艺的“神性之维”和文艺的“源初道德之维”,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有着内在逻辑勾连的较为完整的思想系统,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指示了一条“道路”。

将海德格尔对“文艺超越性品格”的理论诉求与实践坚守纳入当下的时

代语境中进行观照,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特殊的理论价值和当代意义:第一,现时代文艺创作对“超越性品格”的遗忘,已经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后果,步入了越来越多的“误区”:“理想”质素的缺乏、“人文关怀”的丧失、“媚俗”和对现实进行“文化—审美批判”职责的放弃等等。海德格尔关于“文艺超越性品格”那些极富本源深刻性和现代眼光的独特丰富的思想,至今仍具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穿透力,可以成为疗治现时代某些文艺疾病和精神乱象的一剂良药,对于探寻走出误区和困境的道路具有切近的现实意义。第二,关注“文艺的超越性品格”,原本是自“文化轴心时代”以来中西方文论美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尽管它曾经存在某些时代的局限性),如今这一传统却慢慢被疏远和遗忘了,而海德格尔对“文艺超越性品格”的诉求与坚守则可以唤起人们对这一传统的重新关注、重新评述和批判继承。第三,凭借其出自本源的深刻性、独创性、系统性和开放性,海德格尔可以以其关于“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位居柏拉图、康德等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艺术哲学思想家之列;而研究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清理中西方文论美学中的相关思想资源,还将大大促进对“文艺超越性品格”本身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海德格尔 文艺的超越性品格 消费文化 价值理性 乌托邦

Abstract

This book, for the first time, takes the issue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the core,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re-examines and interprets Heidegger’s thought progression and poetic thought system.

Heidegger stresses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elaborates too much on it. This is not only the component of his poetic thought but also the key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his poetic thought. No doubt,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becomes the one of major principle in the current literary creation and poetic-aesthetic studies. But it has escaped the scholars’ attention.

The reasons about why it has escaped the scholars’ attention lie in “scientificism”,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ism” in addition to the political subtleties, reception or rejection, Heidegger’s ambiguity in naming and complexities in Heidegger’s thought. In fact,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has penetrated the process of Heidegger’s philosophical-poetic thought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established a thought system directed by the implicit logical links.

It may start from the monumental work *Sein und Zeit* (1927), make a breakthrough in “*Vom Wesen der Wahrheit*” (1930) from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Wegmarken and develop much in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1935) from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Holzwege*, two volumes of *Nietzsche* (1936—1946), *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 (1936—1968) and a few lecturing materials on Hölderlin’s hymns including *Germanien*, *Der Rhein*, *Andenken*, *Der Ister*, and *Wozu Dichter*. Moreover, it is furthered in *Beruf über den Humanismus* (1946) from *Wegmarken* and *Unterwegs zur Sprache* (1950—1959), and ends in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1910—1976) as well as his testament about Hölderlin’s hymns. Overall, Heidegger devotes his lifelong efforts to a study in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Great Literary Works concerned.

From the “*existenzial – ontologisch*” standpoint, Heidegger first makes a brand-new examination of such issues as “beauty”, “art”, “artistic works”, “poetry”, “truth” and “language”; Heidegger second makes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rt and truth, the inner link between art and *Dasein* and the mission of artist in the dark epoch.; Heidegger third makes a re-assessment of such concepts as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of art’. In addition, Heidegger makes a never-endi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iterary Works that have always been neglected in history. All that Heidegger has ever done fully demonstrates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rough these unique, creative and depth-in demonstrations, Heidegger throws light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 Metaphysical Dimension, the Divine Dimension and the *Ursprünglich* Moral Dimens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a comparatively perfect thinking framework concerned.

Heidegger’s concentration on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of the following theoretical values: 1) a remedy for curing a certain artistic disease and spiritual confusions in contemporary times; 2) a new call for the criticism,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 concerned; and 3) a useful ordering of ideological sources in Chinese-Western aesthetics and an enhancement in thinking on the theoretical aspect of the problem

6 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Keywords: Heidegger; the problem of “the Transcend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consumer culture; valuational rationality; Utopia

序一：一种重新解读海德格尔 诗学思想的方式

朱立元

在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了三年，又经过两年多的反复修订，钟华教授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之思：海德格尔诗学思想新探》。作为联系导师，我甚感欣慰，并乐意为它的出版写上几句话。

钟华教授是我十几年来所联系的“博士后”中最为勤奋、扎实的学者之一。记得进站第二年暑期，天气特别炎热，留在校园里的学生已经不多，博士后更是屈指可数。钟华教授为了集中精力写作出站报告，硬是留在学校不回家，冒着高温酷暑，大汗淋漓地日夜苦战，我听说以后十分感动。本书就是这种执著于学问的勤奋精神的成果。

对海德格尔其人其思的译介和研究，无疑是近 20 年来中国学界中影响最为深巨的“重大事件”之一，其对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研究的影响，尤难估量。而这种影响并不如有的学者认为的是海德格尔所引导的，恰恰相反，是中国学界主动选择、引进、接受和传播的结果。

作为 20 世纪一位伟大的诗哲，海德格尔以其独特的问题视野、深邃的运思方式、精妙的文本阐释、别具一格的诗意言说，反思西方思想长期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倾向，感召思想者们重返前苏格拉底时代那种“思—诗同源”、“思—诗一体”的诗性智慧；反思西方艺术思想史上浓重的科学化、专业知识化倾向，感召诗学—艺术哲学家们重新担负起“为一种历史性此在的伟大的

自我沉思服务”的使命和天职。这些思想无疑都是振聋发聩的。此外,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思想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深度契合与交融,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海氏思想与中国学人之间的距离。于是,海氏的“诗学—艺术哲学思想”,“作品—文本阐释实践”,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深广度是20世纪西方学界公认的,不是哪几个人用“主观唯心主义”之类的简单判决就能轻易地否定得了的。

钟华教授研究海德格尔诗学不自本书始。他曾以《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为题,深入考察过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之间的联系。该书以翔实可靠的资料和扎实有力的分析,为我们展示了海氏走向中国道家精神的独特路径,以及海、庄二人诗学思想本质上的相通、相异和可以进行“生产性对话”的可能性,显示了其治学视野的开阔和理论功底的厚实,并为他后来进一步做海德格尔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今,他的这本新作又以“文艺的超越性品格”为核心,重新清理和解读了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系统,可谓是其近年来潜心研究、深入思考的精心之作。

海德格尔的诗学思想博大精深,且重在通过阐释各类经典文本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例如其早年致力于阐释希腊古典文本,后期则转向阐释荷尔德林诗歌。其大弟子洛维特曾感叹道:他的老师越是通过阐释别人的著作来表达思想,其思想的强度越“不可把握”。海氏“作品—文本阐释实践”的重要性的研究的困难度由此可见一斑。如何准确地把握和评价海德格尔的“作品—文本阐释实践”,对于理解和把握海氏的诗学思想至关重要。

在本书中,钟华教授系统地梳理了海德格尔的重要文本,提出并论证了“文艺的超越性品格”是海氏终生诗学思想的核心诉求的观点。我觉得这是有创意的。据我所知,最初推动他做此选题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海德格尔与其他文艺理论家的显著区别究竟何在?经过初步研究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海德格尔从不孤立地思考‘艺术’问题,而总是要从‘艺术与我们的历史性此在的内在关联’、‘人的诗意栖居’出发运思使之‘源出存在而通达存在之真理’,从而成为其‘存在之思’的一部分,使之‘为一种对历史性此在的伟大的自我沉思服务’,亦即为实现‘此在’由日常的‘非本己本真的存在’向‘本己本真存在’超越服务。海德格尔所沉思的‘艺术’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而是‘伟大的艺术’;他所阐释的‘作品’也非碰巧遇到的任何感兴趣的作品,

而是荷尔德林、里尔克、特拉克尔、梵高等伟大诗人或伟大艺术家的‘伟大作品’；他对尼采艺术哲学的研究，突出的是其关于‘伟大风格’的思想；他对‘美学史上六个基本事实’的反思，始终围绕着‘伟大艺术’在古希腊的产生和在现代的沉沦乃至趋于终结与‘美学’学科发展史之间的落差等等。而且，与此前康德、特别是席勒以来一直到尼采的西方‘浪漫派美学’的‘审美救赎’主张也不同，海德格尔并没有走泛泛地谈通过所谓‘审美体验’、‘审美教育’以‘重塑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老路，而是强调将‘救渡之路’寄托在与伟大的诗歌、伟大的艺术作品展开‘思与诗的对话’上。因此可以说，他关于艺术的一切沉思，都是试图向在近现代社会中已经‘沉沦’的‘伟大艺术’之重新出场、重新上路发出吁请。而对‘伟大的艺术’的吁请，实质上就是对‘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召唤。”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钟华教授系统地梳理和重新解释了海德格尔的重要文本。他的研究有力地表明：围绕“文艺的超越性品格”问题，海德格尔诗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钩连的思想系统。这个内在的思想系统，自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中确立其“起点”以来，在海氏一生的哲学沉思和作品阐释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深化，最终成为了伴其终生的“天命和天职”。

在我看来，钟华教授对海德格尔诗学的阐释，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钟华教授有一定德文功底，在研读海氏著述上，大多采用第一手西文资料，辅以汉译，来路可靠、翔实。据我所知，钟华教授作研究时要求自己在谙熟文本的基础上，有论必证，有据必引。在本书中，这种治学理念和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本书中，对海氏文本的详细疏解，占据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通过对海氏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思想文本中相关内容的提要钩玄，他为我们展示了海氏对文艺的超越性品格问题的系统看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能够从历史研究的高度，尽力去贴近和还原海氏对诗学—艺术哲学问题的“独一之思”，从而使之开显为一个有始有终的统一的历史性建构。透过钟华教授的这番解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海氏的诗学之路起于《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存在论”分析，途经1930年左右著名的“思想转向”，以1935—1946年间对“艺术—存在”问题的集中思考为展开，深化定型于1946年后对“语言—存在”和“技术—存在”问题的思考，最终在耳顺之年成其圆满。正如

第二章开篇所言：“本章主要采用实证加点评的方式，大体以时间为顺序，主要以海德格尔的著述为根据，力求概略但却明晰地勾勒海德格尔一生中关注、探讨并以实际行动坚守‘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事实，以期证明‘文艺的超越性品格’是海德格尔的终生诉求这一基本论断。”纵观全书，对原始资料的占有（其中有不少新材料）、对海氏著名命题的疏解和还原，与作者本人启人深思的阐释，可谓是相映成趣。我个人认为，钟华教授在这一方面的治学态度和路径，是值得嘉许的。

第二，以独到的问题意识来观照海德格尔诗学—艺术哲学思想，力求系统地还原和解读海氏的内在诗学系统，指出海氏诗学思想的系统性和创新性。众所周知，海氏乃是以其独特的提问方式和深邃的问题意识独步于西方哲学史的。因此，在研究海德格尔思想时，提问能否“一语中的”，能否“切中肯綮”，无疑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本书始终以“此在之生存—存在的超越性渴求”为本源，以文艺的“形上之维”、“神性之维”、“源初道德之维”为主干进行清理和阐释，清楚地彰显出了他考察海氏诗学思想时自觉的问题意识：自始至终紧扣“文艺的超越性品格”问题入思。并且明确指出：“如果说‘审美性品格’是一切文艺作品的基本品格，那么‘超越性品格’则是伟大的文艺作品必须具备的根本特征，它是在‘审美性品格’基础上的向更高层次的升华。而上述三个方面，正是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三大基本维度。一部作品，至少应当在其中的某一方面有所揭示，方能越出平庸，臻于‘伟大’。”正是借助这一独特的问题意识，钟华教授得以将海氏的理论诉求和“作品—文本阐释实践”纳入一个诗学话语系统，并探讨其对西方美学史上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范畴如“美”、“艺术”、“艺术作品”、“诗”、“真理”、“语言”等所做的“重新界定”及其创新所在。钟华教授特别指出，这种创新实际上是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通过精妙的文本阐释与伟大的诗人或艺术家进行“思与诗的对话”的结果。这种导向存在之源的“救渡之路”，这种对“伟大艺术”之“超越性品格”的“吁请”，是对德国观念论对艺术所下判词（这类判词的顶峰便是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的直接回应。由此，海德格尔“诗学—艺术哲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的重要地位也就昭然若揭了。应该说，钟华教授对于海氏内在诗学思想系统的独特提问和解读，弥补了目前海德格尔诗学研究中的一个欠缺和不足，本身也是一个创新。

第三,通过对海氏诗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和解读,重新提出了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问题,回应了当下的文艺现状和危机,为当代美学研究贡献了有益的意见和建议。钟华教授着重提到马克斯·韦伯关于“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的论述,认为人文学科研究需要一种“乌托邦精神”和明确的价值判断。因此,他没有满足于仅仅解读海氏的“玄思”,分析海氏的关键概念和命题,而是进一步追问海氏对文艺的价值立场设定和价值观念取向。他清晰地指出,在海氏看似“高头讲章”的道说背后,是其对于西方命运的深切关注,是其对现当代危机的全面回应。钟华教授在书中辟专章讨论海氏之思对于现时代的特殊意义,对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价值理性和价值判断问题进行了思考,对现代“乌托邦精神”予以了同情的关切。在此解读中,他将海德格尔视为对伟大人文价值的透彻揭示者和继承者,并在这一路径上拒绝了后现代理论和消费主义文化对文艺的超越性品格的解构。应该说,在当下纷纷扰扰的理论思潮和时代效应下,钟华教授清醒地思考了人文学科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价值关切和价值判断问题,拒绝堕入时下流行的某些花里胡哨的理论立场。在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日益匮乏、文艺创作的理想质素日趋式微的时代语境下,重读海德格尔诗学思想无疑是一条苦路,却也因此是一剂良药。只有沉著的思考者,敢于直面时代精神的困扰。

总而言之,虽然对该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和表述我并非完全赞同,但我认为它无疑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准、体现了作者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较强创新能力的成功之作。钟华教授是一位在学术上非常勤奋、执著的年轻学者,我希望他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2011年10月写于美墅静心楼

序二：“我思故我在”与“我在故我思”

阎国忠

在我接触过的研究海德格尔的著述中，钟华教授这部书是写得比较明白透彻的一部。作者从系统的梳理中确信海德格尔哲学—诗学的核心是文艺的超越性问题，同时以文艺的超越性问题为线索对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和命题作了仔细的辨析和阐释。这样，既让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的博大而几近繁芜的一面，又让我们领略了海德格尔的深邃乃至玄奥的一面。受他的启发，我写了一则心得，放在这里，权且作为序。

谈起超越性，我想到了“我思故我在”与“我在故我思”这两个看似相反的命题。

无论哲学家们怎样评价，我相信这两个命题就其逻辑与历史性内涵来讲是真实的、合理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讲：任何科学都是“一种历史科学，关于人的思维发展的历史发展的科学”。我理解这应该包含三重含义：第一，任何科学都是历史，包括思维发展史的产物，是对历史提出的问题的回应；第二，任何科学的价值和意义都是在历史中被确认的，因而只有置放在历史中才能获得准确的说明；第三，任何科学都是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融入在历史中，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我思故我在”之所以是真实和合理的，不仅是因为它见证了18世纪之

前的一段历史，一段思维发展的历史，也是因为它为以后的历史，以后的思维发展史确定了一个方向，开辟了一条道路，营造了一种氛围。

我们可以不赞成笛卡尔那种将“思”与“在”并立起来的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但我们不能不同意他说的“我在”与“我思”相互关联的直接性：作为“在”的“我”的本性就是“思”。我可以没有肢体，也可以没有五官，但我不能没有“思”。这个“思”，像笛卡尔自己说的，包括思虑、欲望、情感和想象。

“我思故我在”，并不是说“我思”，我才存在，而是说“我思”才确证了我的存在。“我”不能与“思”切割开来，因为“我”就在我的“思”中。打开自己的相集，从牙牙学语到皱纹纵横、鬓发斑白，我惊异我的变化，但丝毫不怀疑那就是我，因为我在我的“思”中；我显达时，不忘记曾有过的落魄，我悲痛时，不忘记曾有过的欢欣，我相信如此踟蹰行进的是同一个我，因为我在我的“思”中。而恰是我的这样那样的“思”确证了“我”这样那样的存在。

从“我思故我在”，我们努力追寻着笛卡尔——从“思”的笛卡尔，到“在”的笛卡尔。我们相信，确有一个被称做近代哲学巨匠和开创者的笛卡尔因“思”而存在过。

“我思故我在”是讲认识论，它所回答的问题是认识，或者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思”无疑是最基本的和最原初的问题，因为所谓认识或知识不过是“思”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与它相对的“我在故我思”则是讲存在论。就存在论讲，它所回答的是“在”如何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思”，而是“在”才是最基本最原初的问题，只是由于“在”，“思”才成为可能。“思”的根据、指向、意义全在“在”。

笛卡尔之所以能够“思”，是因为他“在”。如果他不是生活在18世纪，如果他头顶上不曾覆盖有宗教蒙昧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阴云，他周围不曾遍布有启蒙主义的躁动和呐喊，如果他不曾从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中获得足够的启示和勇气，他能够成为作为思想者的笛卡尔吗？

“我在故我思”，这是被称做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必然的结论。存在主义从对“我”的思索中意识到，“我”不就是“思”，“思”不过是身体的一种功能；“我”是我的身体，而身体与周边环境是联系在一起的。海德格尔将其称为“此在”。“此在”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具有“世界性”；同时，是在时间中绵延的，具有历史性。“我”之所以要“思”，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激发我们思

想的东西”，是它“召唤”我们去“思”，而我们虽具有“思”的本性，但认真说还需要学会“思”，因为所谓“思”不是单纯“主体”的行为，而是对“存在之本质的要求”的一种“应和”。

笛卡尔无须怀疑“我”的“在”，只需“我”的“思”，因为恰是“我”的“在”，迫使上帝开始退隐。“我”充满了自信。而海德格尔却必须追问“我”的“在”，因为上帝死了之后，“我”并没有真正出场。“我”只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才是我。就地位来讲，“我”是“被抛到世界中”来的，“我”是个漂泊者。就意义来讲，“我”不过是个“计算机”，而自然是我的“加油站”。我必须行动，而为了行动就需要“思”，但这不是笛卡尔式的“表象的思”，而是“沉思之思”；“思”的目的不是确证我的“在”，而是“思索此时（当前的世界时刻）此地（这块故乡的土地）关系到我们每个个体的东西”，“思索在一切存在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意义’”。

“我思故我在”是建立在“我思”与“我在”直接的关联性上的。“我思”就是“我在”的表征，“我在”就是“我思”的根据。只要我“思”着，我就“在”着。我不可能在没有“在”的情况下去“思”。当笛卡尔无视这种直接的关联性，以“共同意念”与“良知”作为“我思”的前提，去确证上帝和世界的存在的时候，显然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因为“共同意念”或“良知”对于我“思”与“在”都不是必然的。不过，笛卡尔有理由仅仅在“我思”的基础上构建一种逻辑，因为在他看来，“思”是人的本质，判定“思”的合理性或合法性的，只是“共同意念”与“良心”，只要“思”得“明白、清晰”就应该是确定的、可靠的。所以，如果说从“我”到“上帝”、到“他人”和世界是一种超越，那么，这只是“思”的超越，即逻辑意义上的超越。

而海德格尔讲的是“在”的超越。在海德格尔看来，“思辨辩证法”和“思想观念运动”并不能触及现象学讲的“事情本身”。超越的真正意义不是确证自己和与自己相关的世界，而是超离“无家可归”的状态，回归“天、地、神、人共在”的原初世界，也就是钟华教授讲的，超离“非本己本真的存在”，达到“本己本真的存在”。这种超越，从根本上说，是人的“本质要求”，是人的“天命”。“存在是绝对超绝的”，但这不是指时间或空间，因为存在就是“人的此在的澄明”。所以超越，就意味着“放弃对以往关于思的事情的思”，以便对现在有所“道说”。